

# 激蕩歲月

(上册)

錫商

1895-1956

陆阳 沈云福 / 著



# 激蕩 歲月

【上册】

陆阳 沈云福 / 著

锡商1895—1956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 / 陆阳，沈云福著

· 一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126-3716-0

I. ①激… II. ①陆… ②沈… III. ①商业史—无锡市—1895～1956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2508 号

## 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

---

出版发行：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170×240 1/16

印 张：40

字 数：530 千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978-7-5126-3716-0

总 价：80.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谨以本书向实业先驱和所有创业者致敬

# 序

周海江

屈指一算，2015年恰好是无锡近代民族工商业诞生120周年。120年前的1895年，无锡业勤纱厂建成投产，掀开了无锡近代史的崭新一页，也在江苏乃至中国民族工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企业体制开始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演变为“绅领商办”，标志着从事现代机器生产且按市场价值取向的商人群体横空出世。

“百年锡商”正是从这一起点出发，虽历经起落波折而持续腾跃，书写了无锡百年工商城一部激荡创业史，成就了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和当代乡镇企业的两个发源地，继而开创了民营经济繁荣的新格局。无锡百年繁华绵延不绝，至今民营经济位列全国城市第一方阵，盖源于斯、兴于斯。

在锡商120周年纪念和全球锡商第二届大会召开之际，《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的推出，恰逢其时，对于展示锡商创业历程、揭示锡商精神风貌、警示锡商发展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一书的两位作者陆阳和沈云福同志，长期研究无锡近现代经济发展史，近两年为写此书广泛收集和精心整理了大量锡商史料。第一作者陆阳同志工作之余辛勤笔耕，经常挑灯夜战。围绕此书，市政协、市工商联及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相关课题组，多次策划指导和修改讨论。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发轫、发展、波折到转型的作品，也是系统书写民族工商业时期锡商沉浮腾跃和展现锡商创业精神的专著，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百年锡商，百年辉煌。在两个甲子期的岁月间，一代又一代锡商在创造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日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的“锡商精神”。“锡商精神”，正是锡商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我们今天研究锡商，除了厘清锡

商波澜壮阔的奋斗史，更要发掘和弘扬蕴含于锡商群体中的内生动因和文化力量。

关于“锡商精神”，2013 首届全球锡商大会将其提炼成这样几句话：“敢创人先、坚韧刚毅、崇德厚生、实业报国”。“锡商精神”正是一代代锡商接力逐鹿市场、争当经济英豪的真实写照。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无锡一批商界先驱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兴办实业，抵制洋货，维持民生，拯救家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工业产值已位居全国第三。锡商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活跃的地域性商人群体和企业群落。到了七八十年代，锡商凭藉改革开放春风，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勇气，冲破思想禁锢和体制束缚，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体现无锡特色的改革发展之路，形成了闻名遐迩的“苏南模式”，再次奠定了无锡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无锡由此被称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跨入二十一世纪，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面对更为广阔也更为复杂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拼抢市场、创新科技、做大产业，创造了无锡经济的新活力、新优势。这正是新生代锡商在传承中发展的使命所在。

面对当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考验，面对我国推进“四个全面”的新机遇，今天的锡商仍然需要继承和弘扬“锡商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出色的作为，更加有力的担当，再造新优势，再创新业绩。

一要把握宏观趋势，坚持做大实业。既要看到全球信息化、金融化的发展新趋势，又要坚持做大自己的实业。立足实业，是锡商的一贯传统。今天的锡商，要积极抢抓国家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等带来的重大机遇，大力推进股权结构、经营机制等方面的改革，推动企业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转型、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跨越，为提高企业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奠定基础。

二要依靠创新驱动，坚持转型升级。敢创人先，投入科技，是百年锡商发展的灵魂所在。今天的锡商，更要以全球视野来构筑企业的人才优势、科技优势和发展优势，把转型升级当作永恒业态，不断加大技术、产品、管理、商业模式创新力度；推进产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建设智慧企业；推进产业与金融的高度结合，实现产融一体。

三要树立诚信形象，坚持依法治企。诚信是锡商的立企之本、经营之道、制胜之器。今天的锡商，更要认清全面依法治国、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事带来的新规则，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进一步增强守法诚信意识，把依

法治企、诚实守信融入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

四要强化社会责任，坚持回报社会。商之大者，为国为民。义利兼顾、造福乡梓、回报社会，是锡商的光荣传统；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富而思仁，是锡商的应有情怀。今天的锡商，一定要饮水思源，尊重劳动，善待员工，关爱社会，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活动，不断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站在锡商120周年纪念的历史节点上，面对老一代锡商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我们新一代锡商有责任、有能力去创造和续写新的辉煌！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无锡市工商联主席、红豆集团总裁）

# 序

董志凯

在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无锡商界不仅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而且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的“锡商精神”。这是近代锡商在商界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通过再现锡商历程，达到揭示锡商精神，提炼锡商智慧，昭示锡商未来的目的，是作者撰写这本书的宗旨。遵照这个宗旨，作者饱含实业情怀、创新情怀、家国情怀，经过长期积累与反复磨砺刻厉，将这部史稿奉献于世。

本书所言的近现代“锡商”，不仅是自然人意义的商人、法人意义的企业，更是经济学、社会学意义的企业家。其具有独到特点：

在产业结构方面，与徽商、晋商大都从事贩进卖出的商贸活动相比较，锡商更注重实业运作，兼顾商业，营商的目的是为了实业的进一步拓展。近代锡商创办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业、食品工业及日用品工业等轻工业，这些工业品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在经营管理方面，注重建立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锡商的经营举措，与机器、工厂、工人、竞争、效率、市场、商标、法治、公平、股份公司等体现工业时代的“新潮”。与同时期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相比较，更加展现开放的心胸和姿态，对先进生产力、先进管理方式，以及世界工商文明的高度认同和追求，导引无锡的民族工商业快速发展，形成了竞争而不垄断，开放而不封闭的经济环境。

在城乡关系和社会结构方面，近代企业的影响与作用，推动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为保障工业原料来源，锡商群体组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农场和合作社。以薛氏永泰丝厂为龙头的无锡缫丝业几乎控制了江浙两省大小茧行，荣氏兄弟的企业在农村广设众多麦庄、办花处，收购小麦、棉花。江南农村的传统经



济结构慢慢解体，开始步入与近代工商业相衔接的轨道。人们的衣食住行逐渐与近代工商产品紧密连接起来，开始习惯穿美观轻便的机织印染布衣服，吃碾米厂出品的大米、面粉厂出品的面粉，建造中西合璧的厂房住房，乘坐轮船、火车和汽车，城市出现自来水和电灯。

在社会风气方面，锡商义利兼顾，造福乡梓，体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超越了只为一己之利的狭隘意识。他们热爱家乡，努力实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如荣德生记载1904年无锡的情况：短短三年时间使无锡构建起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教育优势，在整体上提升了无锡人的素质和城市的文化底气，也使得无锡在上世纪前半期出现了空前的人才蔚起、英才辈出的时尚。

在百年来历史的几个关键时刻，锡商群体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竭力拓展。当西方列强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无暇东顾之时，“锡商”赢得了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全球性经济危机刚刚过去，“锡商”重振旗鼓，稳步壮大；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国土之时，锡商不向敌人屈服，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当战争硝烟刚刚散去，“锡商”又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了兴废重建；新中国成立前夕，无锡商界许多成功人士决心留在祖国大陆，努力恢复生产，支持经济建设。

今天，世界面临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处于重要的发展与增长的转型期。国民财富仍然主要来源于生产，而要生产就必须创新，这样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对于我国这个在世界工业化征程上仍相当年轻的国家，实业与创新方面能否执着并立意领先，决定着在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位置。值此新的历史关键时刻，重温“锡商”的历史，推崇发展实业、立志创新的精神，具有现实意义与重要价值。

笔者于1997-1998年参与了陈翰笙先生开创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第四次调查）；在经济史研究过程聆听过陈翰笙、薛暮桥等无锡出身的前辈的诸多教诲，对无锡的历史及其先贤怀有深深的敬意。故陆阳先生提出建议时，不揣冒昧书写以上感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中国现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 前言

## 激荡岁月，总是让人着迷

—

近代无锡的崛起，颇具传奇色彩。历史上的无锡，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但进入十九世纪后，无锡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率先进入近代城市行列。到抗战前夕，已经跻身于中国“六大工业都市”行列，工业产值位居全国第三，工人总数仅次于上海。无锡，对于区域对于全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作为一个县城可能达到的极限。

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兴起，竟然源于那场让中国人至今痛彻在心的甲午战争。日本明治维新后催生的近代体制与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体制，在那一刻发生猛烈碰撞。战争的失败，却在不经意间催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在这个新纪元里，商业的力量，开始被正视，沉寂数千年的古老国度逐渐解冻，一幅波澜壮阔的商业画卷逐渐在无锡展开：

近代中国最早的民办纺织企业业勤纱厂在古运河畔创办；官宦子弟薛南溟和“草根”周舜卿捕捉到“新政”春讯，进军缫丝业；雄心勃勃的青年荣氏兄弟从广生钱庄走出，从吃、穿两门入手，开始了艰难跋涉。

辛亥革命爆发，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一切都变得不可逆转，资本的水流渗透进干涸的土地。更多的锡商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从商之路。小小锡城，闪烁着实业的星星之火。

接下来的岁月，始终洋溢着“革命”的气息。世界大战、北伐胜利、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在这样的时代，人的潜能被发挥到了极致。荣家快马扬鞭，一路奔跑；杨家左右腾挪，名扬南北；唐家恪守主业，厚积薄发；薛家突破藩篱，引领创新……一时，大商如云，王者归来。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与那个时代相匹配相合拍。

甲午一役，日本第一次真正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从此大力扩张军备，终于在

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硝烟弥漫，民族工商业遭受空前浩劫，却击不垮商人的理想与信念。沦陷区的民族工商业苦苦挣扎，艰难持守；而在大后方，商业吸收死者的血、生者的汗，生根发芽，生长出别样鲜艳的花果。

抗战胜利，内战又起。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在经济上的进退失据，让试图复兴的民族工商业深受其害，也亲手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当旧社会的苦难以战争的方式彻底结束之时，商人们的两难抉择，有了些许悲伤的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民族工商业的鼎力支持，让新中国的商业史开篇就充满了火红的暖色。随之而来的公私合营，固有的传统与变化的时代“并轨”。其间的阵痛和不安，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走完了最后一程，不过“脱胎重生”的国有企业延续了生机，日后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乡镇企业又悄然萌生。

滔滔运河水，带走的是昔日的荣耀和悲伤，不变的是百年锡商激荡的前行步伐。

## 二

风起青萍之末时总是无人知晓的，等到大风起兮雷霆万钧之时，大千世界才蓦然回首，细细品味这风光无限的成因和改天换地的后果。

有经济学家这样诠释宏观环境：“宏观就是这样，永远有人在悲观时更悲观，有人在狂热时更狂热，也有人冷眼看世界，更多人是墙头草——两边倒。”

这就是宏观环境的复杂性，任何波澜壮阔的序曲，都离不开大开大合的时代撞击。离开了时代的背景，任何经济理想只能胎死腹中。

清末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灾难最为沉重的一个时期，列强环伺，鲸吞蚕食。思想家郑观应苦苦思索民族复兴之道，最终认定“兵战”与“商战”是复兴之两大主题。于是，商业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御外侮、裕民生”的历史使命，并贯穿了民族工商业发轫、兴起、勃发乃至消退的全过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

薛南溟自称：“经营地方实业垂三十年，思欲以西国新法导中国利用之，以蕲福国利民。”唐保谦也说：“言利，非以自饶乐，思自效工贾，以此远谟而为国家塞漏卮，为乡里兴大利。”荣德生更言：“逊清末叶，五洲棣通，外机制棉纱纷纷运入我国，至国内固有之手工纺织业淘汰殆尽，宗铨鉴于利权外溢，民生凋敝，苟不急起直追，势将侵略无余，爰于让清光绪三十一年集股创办振新纱厂，藉资抵制于万一。”铮铮豪言，掷地有声。

除此以外，更多的成功因素可以从文化“软资源”方面去解读。或许，这才是锡商崛起的最为根本、最为基础的动力。南宋时期工商意识的增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诞生注入了最初的基因。鸦片战争以后，工商文化开始处于明显的主导地位，“趋利”的心理暗示，形成无锡地域文化中的唯实精神，使无锡人具有了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务实。人多地少，又促使人们甘于强烈的突破地域界限、资源界限甚至文化界限，形成了开放竞争的意识。更者，艰难的创业过程，优胜劣汰的经济法则，更加强化了无锡人灵动进取与义利兼顾的处事原则。这种灵活性，有时候就表现为精明，或者被外人理解为聪明了。

比如开放竞争。锡商一方面接受上海的辐射、扩散，一方面集聚来自内地腹地的资源。杨氏兄弟创办业勤纱厂时曾争取到十年间百里内独家经营的“专利权”，周舜卿开办裕昌丝厂时标榜为“奏办”，但他们都没有限制别人开设同类企业。无锡与常州及周边城市同行企业之间，既相互竞胜，又联合协作，谋求共同发展，形成一种共生互动、开放竞争的格局。这种开放竞争又集中表现为对洋商洋货的竞争抵制。丁熊照、匡仲谋勇于挑战洋商名牌产品，唐星海在管理上与外商企业争高下，薛寿萱联合同行企业越过洋行，直接进军国际市场，都体现了这种开放竞争的精神。

比如务实进取。无论是创业伊始，还是扩张展业，抑或遭遇挫折，锡商都表现出坚忍不拔、勇毅精进的志向和气度。荣宗敬的企业扩张理念人们都不陌生，他所说“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足以让人震撼。而被人视为温和的荣德生，创业雄心也不亚于其兄长。他晚年规划“大天元计划”，决心“另成一新时代”。面对别人的质疑，他说：“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

比如义利兼顾。锡商甘任辛劳，艰难创业，固然有着积聚财富的利益冲动，但“实业报国”始终是他们心中的精神支柱，“造福乡里”则成为他们投资经营活动的现实托付。荣氏兄弟等一批锡商在无锡办工厂，兴教育，修路桥，接电灯，通电话，发展各类公益事业，催动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唐家延续三代数十年热心于赈灾救荒，散发着一种简单明了的逻辑：当财富和慈善逐渐融合，并沉淀为一种精神之时，新生的商人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比如诚信经营。诚实守信是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也为历来锡商所信守。荣德生有鉴于商道基于人道、为商本自为人，主持编写印行《人道须知》一书，

以期“振聩发聋，启迪人心”。其中“忠信”单列一卷，逐条阐述士、农、工、商必须恪守的诚信准则。他本人则以“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的联语，作为为人处事的信条，认定“吾辈办事业……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他为故居书房取名“戒欺室”，正是出于对诚信的追求。后来荣毅仁请邓小平重新题写此匾额，并作为一生执守的从商准则。

精神不灭。新中国成立的数十年间，商业一度“销声匿迹”，但这些固有的精神得到了延续传承，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被深藏的优秀品质再次迸发，锡城的商业再次气象万千，又一次收获了沉甸甸的成果。

精神更需要传承和弘扬。锡商精神经过百年孕育，熔铸成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精神品格，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社会核心价值。尽管时代更迭、历史变迁，这一人文精神可能会有所冲淡，其表现形式也会发生某些变化，但在今天它依然是一笔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弘扬。

### 三

人的记忆，在时光的洗涤下会逐渐固化、抽象化，记住的只是辉煌，曾经的残酷和苦难往往会轻易地过滤。

清末以前，数千年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无商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包含着轻视工商的因素，“君子不器”，传统读书人以坐而论道为高尚，以出仕君王为荣耀，专注于猎取功名禄位，不得志便退而修身养性，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重农抑商，农业立国，经过数千年的固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落后。

事实又不可否认，在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虽然创造了荣耀的历史，但“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又承受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压迫，西方列强耀武扬威，官僚资本巧取豪夺。商人们即使再顽强、再坚韧，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侥幸起家，但步履艰难，一旦风雨袭来，就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

于是，荣家刚刚登上事业巅峰，却又迅速跌落，申新“搁浅”，申七拍卖；周氏的商业霸业，因为“少主”失当，短短数年就归于沉寂；薛氏的丝业帝国，一经战火硝烟，就一蹶不振，星火不再。……几多唏嘘，几多悲愤，内在的原由就不难理解了。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

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族复兴的时代大门开启，历史的笔锋变得气势磅礴且意气风发。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普照大地。”

从此，官僚资本销声匿迹，帝国主义的掠夺也戛然而止，民主、统一的和平局面正式形成，与此同时，被战争所破坏的商业规则逐步重建，资源也得到了公正的重新分配，商业的发展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了空前提高，这成了新中国商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回溯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商业史，必须为1949年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此后商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仍然有超越，有倒退，有疯狂的高潮，有窒息的低谷，有单纯而虚妄的理想主义，有复杂而务实的现实主义，但历史的进程是一往无前的，直至今天以大国“身份”崛起。回望历史，这些成绩，就源于那个令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瞬间。

1949年，被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经济史黄金时期的起始年。

在美国，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两个月，哈佛商学院迎来了1949届毕业生典礼。这届毕业生大多经过三十年代初的全球经济危机，也几乎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这个班级被称为“哈佛最杰出的班级”、“令美元失色的班级”。他们中间，走出了强生的吉姆·博克、施乐的彼得·麦克科洛、共同基金的比尔·卢恩等等。

在欧洲，各个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家，都不遗余力展开战后的重建，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凸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高潮。

我国的近邻，日本战败投降刚刚过去不到五年，经济又逐步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国民生产总值相较战败之时增加了一倍以上。

商业的浪潮，在世界各个角落汹涌澎湃。今天的全球竞争大势，在那一刻已经注定最初的格局。

#### 四

时间到了1979年。1月17日上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这五位老人，都是从旧中国走来的工商界元老级代表人物。落座后，小平开宗明义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五老纷纷发表意见，小平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不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小平强调：“钱要用起来，

人要用起来。”中午时分，小平请五老吃涮羊肉。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老火锅宴”的著名谈话。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时期。尽管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被打倒，但最高领导层少数人提出的“两个凡是”政治主张，依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过，积极的变化还是有了——

1977年冬季，高考恢复。61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世界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开始了，最终有超过40万的学生进入了高等学府。

转过年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原作者正是无锡籍学者胡福明。随之而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活动，在思想基础上倡导了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观念，表现在经济变革领域则呼唤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

在这一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无疑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政治生活”从此不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活方式。如果把这次会议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五老火锅宴”举行。

在“五老火锅宴”上，邓小平还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重新“出山”办企业。

不久之后，中央对1956、1957年划定的原工商业者落实了政策。首先是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来定的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当年被定为资本家的86万人当中有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不久之后，16万原工商业者（资本家）的成分也一律改成了干部或工人，也就是意味着这些工商业者（资本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落实政策还包括发还“文革”期间冻结的私营企业主的定息，全国一共支付了24亿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足见中央决心之大。

这一年10月，一个直属国务院的投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出任首任总裁。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信公司扮演了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重要角色。

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在这一年则携带着简单的行装，告别妻儿，从北京南下香港，与他的两个堂兄弟荣智谦、荣智鑫会合，合股创办爱卡电子厂，一开始的业务是将香港廉价的电子表、收音机向大陆贩卖。荣家显赫百年的商业史翻开

了新的篇章，荣智健日后一度攀上“中国首富”宝座，光彩不逊色于他的祖辈。

当邓小平与五老在人民大会堂畅谈商业之时，北京仍处寒冬季节，但窗外的柳条上已经爆出了几许新芽。

## 五

有人说：“一般的中国读者（包括历史爱好者），已经失去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的热情。”

今天，市场经济大潮兴起，人们更愿意沉沦在对于物质的不断追索中，有意或无意躲闪着那些不甚遥远的记忆，曾经的辉煌和曾经的伤痛似乎都被这里的人们所淡忘。

于是，对那些过往影响一个地区、一个时代商业进程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分析整理，就显得如此迫切。我们都知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于历史，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寥寥数语，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史”；其二，它又是有所倾向的，因为它是“当代”的。

换言之，历史既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将来式的。所在的焦点，正如古希腊的波里比阿在《罗马史》中所谈到的那样：“历史之特殊功用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研习过去，则能使我们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今天我们回溯历史，目的就在于从中梳理出激发腾飞的基本因素，再融入当前的实践，续写新的更加灿烂的历史篇章。

六十年，一甲子。回首锡商的历史，回忆那一连串的名字，我们不禁感慨于他们在苍茫时光中的命运多舛，感慨于那一串串鲜活的或悲或喜的故事。单单将这些人名和事件按照年份串联起来，就足以让人们看到这六十年的锡商发展脉络：

首开其端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放弃仕途投身商海的薛南溟，从买办“转身”的祝兰舫、周舜卿，把“大爱”洒向中原的唐保谦，厚积薄发的唐骧廷，推动管理革新的唐星海，拓展毛纺业的唐君远，致力“劳工自治”的薛明剑，传奇红色商人杨琳，西部工业先驱李国伟，怒斥上层“不当”的荣鸿元，带头公私合营的荣毅仁……当然还有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相对于纷繁芜杂的时代，这些人物或许只是众多主人翁中的少数，他们的故事或许只是瞬间的闪亮，但正是无数必然和偶然、个体和群体、时间和空间的水珠与浪花，汇成了一道历史的巨流，有千回百折、壅塞阻滞，也有浩浩荡荡、横



无际涯。

二十多年前，我在无锡的江南大学读书。那时的这所江南大学并不是荣家当年所创办的那所有着同样校名的学校，但与荣氏仍然有着某种渊源，荣毅仁担任了学校的名誉董事长。学校座落在荣巷附近，离荣家的梅园也不远。

早春时节，是梅园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会经常挑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步行来到梅园，在梅荫里坐下，沏一壶茗茶，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微风拂过，听梅林飒飒作响，看花瓣片片飘落。那时的梅园，不象今天这般喧哗，透着几分静逸安详，一如荣氏兄弟在世时的景象。

正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及与他们有着相似奋斗史的一群商人，以及他们背后的那段荣耀又悲壮的历史。

诵幽堂旁，荣德生的塑像静静地矗立着，眼光深邃，凝视远方。塑像无言，就让我们在香烟缭绕中讲述那段激荡的往事——